

國際政治研究方法的爭論

張京育

一、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行爲科學的研究在美國特別風行，其影響及於其他國家與學術領域^①。在政治學上，投票分析、問卷調查、民意測驗，更是普受重視。其目的是想使政治學從傳統的哲學、史學、和法律學中獨立，借用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和其他學科的方法與理論架構，使政治學的研究齊於科學之林。

國際政治是政治科學的一個附屬領域，它接受新科學方法的洗禮較政治科學的其他部門爲晚。雖然科學研究法已爲政治科學的其他部門所採用（政治哲學可能例外），但在國際政治的研究上則仍然聚訟紛紜。這項爭論與已往不同，不是實質問題的辯論，而是分析方法的爭執。過去，國際政治學者曾有過嚴重的實質爭執，例如奉行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爭，或者採用國家利益、抑國際法或道德觀念作爲指導或評估國際行爲標準之爭均是。但關於研究方法之爭則與上述實質爭執無關。在國際政治的研究上已分爲傳統與科學兩派，科學派認爲國際政治現象即爲社會現象之一種，應該可以利用科學方法求得可靠的說明與規律。傳統派則認爲由於國際政治研究的特殊性，不可能利用科學方法作有系統的了解。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分析傳統國際政治研究的特質，科學派對傳統研究法及其成果之不滿，科學派所採用的新方法及傳統派對科學方法的批評，最後檢討科學方法與傳統方法是否衝突，如何相輔相成。

二、傳統國際政治研究的特質

一切學術努力都在累積系統知識以敘述、解釋、與預測某類特殊現象。研究國際政治的目的即在累積系統知識以敘述、解釋和預測國際政治現象。國際政治包括的範圍和所研究的對象極廣，可以大別爲主體和現象兩方面。主體主要是國家，但亦包

括全球性與地域性的國際組織，國際公司，與其他團體，如巴勒斯坦遊擊隊、劫機暴徒等。並且包括個人。（一般團體和個人的研究以其有獨立能力且能影響政府關係者為限。）至於現象方面可以分為：

（一）外交政策：包括決策者，決策程序，政策實質，外交政策之執行及其手段，如衝突、合作、談判、軍事、經濟、傳播等。

（二）國力分析：包括人口、經濟、技術、工業、地理、軍力、政府領導等。

（三）國際體系：由總體觀點研究國際政治上主體數目、技術能力、軍力配備、理念等變化對國際行為的影響。

（四）國際勢力：推動國際政治的因素：如科技水準、宗教、民族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反殖民主義、對經濟成長的追求等。

國際政治研究的對象既然繁多而複雜，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面臨一個基本的困難：如何使國際政治發展成爲一個漸進累積的，有可以驗證的原理的科學。國際事務的研究雖然已有非常久遠的歷史，許多從事研究的人總是感覺一切需要從頭做起。過去的研究成果往往不能作爲解釋現代國際現象的依據，或解決目前國際問題的指針。

儘管萊特 (Quincy Wright) 教授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戰爭的研究 (A Study of War) 中即採用了行爲研究法，在政治學領域中，行爲研究法在國際政治上的運用是比較晚出的。根據一項調查顯示：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三百餘本國際政治著作中，約只有十分之一採用了新（科學的）途徑^①。其原因是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採用了歷史的、哲學的、法律的和政治理論的方法，長久的與外交史、國際法、時事和國際組織結了不解緣^②。外交史的研究着重歷史事實的正確敘述和解釋，不在尋求一般的原理。歷史研究法的主要價值是敘述和解釋國際政治的變遷。例如就外交方法來說，從前是由職業外交官從事外交，而多數重要事務是由幾個大國決定的。今天由於許多新國家的出現，他們亦要求參加國際事務的決策。再由於技術和理念的發展，外交已涉及經濟、軍事、文化和宣傳的範圍，參與的人士因而大增。同時，外交史的研究有助於我們了解不同的政策和方案的推行及其影響，並可據以評估國家的實踐是否符合該國的目標和宣布遵守的規範。

時事研究的目的與外交史類似。只不過所分析的是當代的事，並且往往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學者不再脫離現實，却成爲

某項政策的主張者或辯護人，例如保護關稅與自由貿易之爭，軍備競賽與裁減軍備之爭是。

法律的方法着重研究國際法與國際組織，從法律與制度的觀點對國際政治作規範性的研究。其最終目的是建立必要的制度和行為規範以達到理想的國際社會。學者變成了宣傳家、改革者。

哲學的或政治理論的方法，往往從一般政治學觀念出發來研究國際政治現象。例如認為人有追求權力的慾望，認為國家亦永遠追求權力，以求自保。再如認為經濟是政治的決定因素，遂主張「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由於採用了上述研究途徑，國際政治的著述包括下列各類：歷史類，例如日美關係，或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德法關係。也有些是研究行為的規範，像外交實例、國際組織或國際法庭對國際爭端的解決。另外的討論國際政治的基礎，例如經濟決定外交政策，或權力的追求決定對外關係等。再有些是研究現實問題像中東危機，或揣測未來日俄關係的發展等。

傳統學者與採用科學研究法學者一樣，着重資料的搜集與證實，邏輯的分析和判斷。在他經過仔細檢查去除偏見，並且斟酌過其他可能的解釋後，傳統學者便寫下他的意見和結論。他認為以他的意見和結論所經過的訓練，可以從資料中提煉出廣泛的原理。但是他通常不明白寫出他的研究方法，在研究過程中更往往依靠直覺和判斷。

三、科學派對傳統研究法之批評

採用科學方法的學者對傳統研究法及其成果不能滿意。他們認為國際政治是社會科學的一支，跟倫理學、神學不同，後兩者不能用經驗方法研究。國際政治是研究個人、國際公司、國家及國際組織在國際體系中的行為，此種行為可用經驗性方法來研究，並找出其因果關係。他們對傳統研究法的批評可以歸納如下：

（一）傳統研究法只解釋特殊事件。在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上，「個案」研究法特別盛行，只研究一個特殊現象，而不研究某些「同類」現象。結果，不免認為每一事件都是獨特的，而不能提出一般性的通則。如果一門學問老是停留在個案階段，它是很少可能發展成爲一門科學的^③。譬如說：人們根據某國決策者的性向，該國武裝部隊擁有的武器，及最近該國外交政策目標

的聲明，來說明該國介入戰爭的決定，在他們研究另一戰爭情勢時，又得從新研究不同的決策者，軍隊裝備，和外交政策聲明。再如人們研究一九三一年日本侵華的「九一八事變」，或是一九三五年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事件。事件本身極具重要性，也有其特殊性。對這些個別案情的了解當然有助於人們通達國際事務。然而如果他們不能找出同類事件的「共通性」，便不能建立系統的科學。個案研究法容易使研究者強調事件的「特殊性」而忽視其「共通性」。使人們只見樹木不見林。

（二）傳統研究法所作的判斷往往無法用試驗日證：傳統研究者所提出的一般原理往往廣泛得可以適用於一切情況，但其意義極為含混，使人們無從證實或推翻。例如說：「外交政策是基於國家利益而制定。」但對同一政策，一位學者認為符合國家利益，另一位認為違反國家利益。人們沒有標準來衡量什麼是國家利益，某項外交政策是否符合國家利益。因此，只好根據「信心」而非「證據」來作選擇。

（三）傳統研究法缺少精確性：傳統研究法所建立的關係和所作的發見，可靠性都很低。一方面是由於傳統學者未曾嚴格界定其概念，另一方面是由於他們依循的是模糊的概念，而非精確的數字。譬如有人主張：一九七〇年代國與國間依存性比一九〇〇年代為高。其根據往往是國際貿易的增加，或是人民間互訪的頻繁。實際情形是否如此？國際貿易的絕對值是增加了，但是其與各國生產毛額間的比例是否也增加了？國際旅遊是增加了，但是否超過了國內旅遊的增加？國際通信的數量是增加了，但是否超過國內通信增加的速度？從科學方法的採用者看來，傳統派往往用常識和模糊的概念來支持他們的論點，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四）傳統研究者不明白確定其原理所適用的範圍與條件：例如提倡權力平衡理論的學者，認為不管國家的數目與種類，動機的差異，武器的系統等，都可適用。因此，這種理論的一般原則便未考慮到時空的差異。再如傳統智慧顯示：甲、敵對國家如自認站在有力地位來談判，最容易就某項爭端達成妥協；乙、敵對國家如採取善意的、溫和的立場，最可能就某一爭執達成協議。此兩點發現可能在不同時間都可適用，但傳統派未說明何時可以適用，在那些條件下可以適用。結果使得人們無法預測。

由於以上的不滿，投入科學派的國際政治學者日見增多。

四、科學派採用的新方法

科學派學者認為國際政治研究的對象既然衆多而複雜，人們不能等待對國際政治有全盤了解的不世出的天才，而要由一般學者分工合作來作集體努力。爲了使學者研究的成果可以比較，參證，而構成系統的知識，研究方法就特別重要。因爲方法是使個人努力能爲學術界服務的標準，使科學努力可以累積。如果有關概念的有系統而確切的陳述、假設的提出與試驗、觀察與量度，及其他類似的活動都能根據一定的原則，那麼，學者就可以作科學的，共同的努力。在天才沒有出現前，共同努力是研究複雜的國際現象所必需的⑥。

另一方面，由於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各方面的進展，國際政治學者深感有借用其他學科研究成果的必要，這也可說是學術分工的擴展。因爲所有社會科學分析到極致，都是對個人行爲和態度的分析。對人類行爲的研究，不管是政治方面、心理方面，社會方面、或經濟方面，或者都有助於國際政治的研究和瞭解。

科學派學者不僅從知識分工的角度來主張科學方法，他們更從國際政治這門學科的特點方面來主張運用科學方法。

他們認為國際政治分析的是總體現象，包括國與國間的行爲與反應，而這些行爲與反應又肇因於個人的態度和行爲，小型團體的衝突與決策，大型組織的壓力，公共機構所賦予的機會與限制，而這些因素又與地理環境，科技水準，自然資源，價值觀念、社會結構、政治組織等密切關聯。推而廣之，所有人類生活與物質環境都與國際政治有關。因素既多，只有用科學方法一一加以分析，才能求得可靠的知識。

從研究國際政治所需要的資料來看，國際政治的研究也必須採用特別的方法和技巧。心理學家可以在幕後觀察病人，社會學家可以挨戶調查一個社區，人口學家可以從人口普查資料中找出人口質和量的變遷，經濟學家可以從各種公開資料中查知生產的物品與勞務。對於一些其他政治現象，像選舉過程和立法程序，可以採用直接觀察法，求得資料，或求證假設；對於政治態度和價值，也可採用問卷和深度訪問方式求得了解。但是國際政治上許多重要資料無法用直接觀察法求得。許多決策並無記

錄檔案。即使有，也往往數十年後才公佈。國際政治所涉及的往往是高度機密，很難容許學者直接參預。爲了研究重複發生的現象，科學派認爲只有嚴格講求方法，以使用經驗或實驗的方式來察知決策者的行動⑦。

科學派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很多，一一列舉並非本文的目的，爲了對這種研究途徑有相當的了解，特選擇幾個研究方法予以介紹。

丁 因素分析 (Factor Analysis)。

科學研究目的之一在執簡馭繁。要用一些可以觀察和計量的概念來說明複雜的國際現象。因素分析便是方法之一。

國內和國際衝突時有發生，如果人們要量度國內與國際的衝突，並且找出其關係與動機——例如內亂頻繁的國家是否可能多作國際衝突——他們應當如何着手呢？

魯默 (Rudolph J. Rummel) 曾做過此一研究。他首先將衝突界定爲：「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當事者，爲了達成必須犧牲對方利益才能實現的目標，所作以精力互相對抗的行爲。」根據此一定義，他找出九項量度國內衝突和十三項量度國際衝突的指標，這些指標是互相排斥的。

國內衝突量度指標

1. 暗殺次數
2. 總罷工次數
3. 遊擊戰之有無
4. 主要政府危機次數
5. 整肅次數
6. 暴動次數

國際衝突量度指標

1. 反對外國示威次數
2. 消極制裁次數
3. 抗議次數
4. 斷絕外交關係國家數目
5. 驅逐或召回大使的次數
6. 大使級以下外交人員被驅逐或召回的次數

7. 革命次數
8. 反政府示威次數
9. 各種內部暴力死亡人數

7. 威脅次數
8. 武裝行動之有無
9. 戰爭次數
10. 軍隊調動次數
11. 動員次數
12. 指控次數
13. 對外衝突中死亡總數

魯默從The New York Times Index, The New International Yearbook,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Facts on File, 及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 找出各項量度的資料，並且採取一定措施以避免因偏見而造成的曲解。

他調查了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間七十七個人口在八十萬以上的國家。爲了找出他所得資料是否有時間上的局限性，他曾與其他學者對其他時代衝突的研究互相印證。發現他的研究發見並不是只適合於他所選擇的時期。

魯默的主要結論得自統計學上的因素分析法。他把原來用來記錄衝突的多項指標簡化爲幾個「一般因素」，這些一般因素各自獨立但可以說明因素間的關係。更精確的說，因素分析從事於：甲、量度某些變數作同一變化的程度；乙、找出這些有高度關聯變數的「羣」。例如要對一羣已作相當充分調查——像平均國民所得，汽車數目等——的國家作因素分析，人們可能發現高所得國比低所得國汽車多。於是所得與汽車呈相同的變化。可以包括在這一變數羣的項目還可包括電力消費、教育程度、平均壽命等。說明這一變數羣的一般因素或可稱爲「消費水準」。魯默也將他的二十二個變數簡約爲六個一般因素，三個量度國內衝突，三個量度國際衝突。國內衝突的三個積次是：

(1) 騷亂 (Turmoil) (自發的無組織的衝突行爲。)

(2) 革命 (Revolution) (公開的、有組織的衝突行爲。)

(3) 顛覆 (Subversion) (隱密的、有組織的衝突行爲。)

國際衝突的三個積次是

(1) 戰爭 (備戰、作戰、及戰爭善後行爲。)

(2) 外交 (非暴力衝突，如大使的驅逐與召回。)

(3) 交戰狀態 (Belligerency) (像斷絕外交關係、實施消極制裁等表示強烈敵對情緒的行爲。)

這六個積次是互相獨立的。根據魯默的分析，國內衝突的頻率與國際衝突的頻率並無顯著關聯，亦無因果關係。與一般常識判斷相反。但在同一衝突積次中，衝突因素是互相關聯且有因果關係。這表示我們可用這六個積次來表示二十二個衝突的指標，這便是以簡馭繁。由於魯默的分析方法是公開的，明顯的，其他學者可以重複他所作的研究來確定其可靠性。

因素分析對複雜現象的研究特別有用。如果人們要研究戰爭發生的一般原因，或者找出聯合國會員國投票時最重要的決定因素，都可採用這種研究方法⑧。

I 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內容分析是「對社會間彼此傳達信息之內容，做客觀、有系統及累積的分析，其目的在從社會間傳達之信息測度社會間之關係⑨。」事實上，任何以文件或其他傳播媒介為主要資料來源的學者都在從事內容分析。在國際政治之研究上，內容分析更受重視，因為國際政治往往不能以訪問或問卷方法取得所需資料，而報章，廣播及政府文件却較易獲得。學者曾利用此一方法來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國皇太子斐迪南 (Francis Ferdinand) 被暗殺死亡。至八月四日，英、法、俄、德、奧等國均捲入了戰爭。為什麼戰敗國在未受直接攻擊前就參加了一個他們不能獲勝的戰爭？它們為何未被強大的對手所嚇阻？德奧是否對其敵方的力量有深刻認識？德奧兩國是否認為它們的實力強過對方？還是它們未預料法俄同盟最後會牽涉英國、義大利

、及美國？爲了解答上述問題，研究的學者提出了兩個假設：

假設一：如果一國在決策時認爲其實力不逮對手方遠甚，則不會主動參戰。

假設二：如果一國認識本國將受重大危害，那麼這個認識將抵銷能力不足的認識，使得能力的認識成爲一個不從重事變的戰因素。

爲了試驗上述假設，研究者從英、法、德、奧、俄五國檔案中檢閱了三千份有關文件，其時期是從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文件選擇的標準是：可用性和真實性；文件內容含有與第一次大戰直接有關的資料，或與巴爾幹政局，軍事或其他與大戰有關的資料。文件的種類有政策聲明，外交訓令與報告，領事報告，情報與軍事報告，各部備忘錄，內閣會議紀錄、議會辯論紀錄、回憶錄、日記等。均限於當時時代的原始文件^⑩。他們所找尋的資料主要有四種：

(1) 能力認知 (A Perception of Capability)：對於別國和另一同盟實力了解的陳述。

(2) 敵意認知 (A Perception of Hostility)：有關威脅、恐懼、與損害的陳述。

(3) 同盟認知 (A Perception of Coalition)：有關其他國家結盟的陳述、或其他國家在受威脅時可能結盟的陳述。

(4) 衝突重要性的認知 (A Percep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A Conflict)：有關衝突的深度、廣度、嚴重性或後果的陳述^⑪。

每一個陳述均記錄在一張卡片上，並且記下其來源與背景，然後再計算其發生的頻率。

從文件上看來，德奧兩國均認識其實力不如三國協商。如果我們假設一國不會在不考慮自身及敵國實力前貿然發動戰爭，那麼，在文件中應當透露出許多實力認知的陳述。如果前述第二項假設正確，則敵意認知必然十分強烈顯著。研究者在分析一六五個文件後，只找出一二二八個實力認知陳述，卻找出四八二個敵意認知陳述。這表示：雖然一個理性的決策者應當在投入戰爭前密切注意對方的實力，但他往往對本身可能遭遇的威脅或損害更加注意。從研究者的發見看，德奧兩國所感受的敵意最深^⑫。因爲他們深感威脅，所以雖然明知實力不及對方，仍然決心發動戰爭。

這種研究方式後來更趨精密化。學者爲了檢查他們對態度和認知的量度是否正確，進一步調查了一九一四年夏天的其他變遷：如黃金的流動、股票市場的變動、小麥的期貨買賣和貨幣交換率等。結果發現這些客觀指標與他們用內容分析所得的結果相符^⑬。

由上述內容分析看來，研究者可用公開文件來找出決策者的動機和意向，並用一定的認知觀念來證明、修正、或推翻某些假設，其過程頗合科學。已有數位學者利用此種研究法^⑭。

（三）模擬 (Simulation)

自然科學家在一定條件下，除以觀察法研究其對象外，還可做實驗。在社會科學中，社會學可以調查，心理學可做實驗。但在國際政治上應用極爲困難。因此，乃有學者採用模擬方式來研究國際政治。想借用實地觀察來證實、修正與推翻一些假設。如果能做到，對國際政治的研究很有好處。

在軍事學上有沙盤演練，也有軍事演習。模擬和兩者相似。事實上，德國在二次大戰前已有「政治演習」，軍事和政治領袖都參加。

一九四〇年日本成立的全面戰爭研究所也從事侵略戰爭的演習^⑮。第二次大戰後，美、蘇兩國政府與民間均曾從事這種政治演習。

此種演習，每國由一人或一個小組代表，另有一人或小組代表「自然」，例如饑荒、政府要人死亡、技術發展，等等非政府所控制的現象。另有一人或小組擔任裁判。參加演習者都是國域專家，對所代表的國家或地區有充分的了解。每個代表團都以政府決策者的身份，按照假想中該國所可能採取的行動而決策。裁判們則有權決定各國政府所採行動是否「可能」，例如是否合乎該國憲法，或爲該國資源所能負擔等。有些行動是公開的，每一個參與者都知道；有些行動是機密的，由裁判決定那些參與者應該知道。在專門機關從事「模擬」演習時，參與者往往先要撰寫一連串的研究報告與戰略文件。演習時間可能延長到好幾個月。有時爲了模擬真正的危機，好幾天不眠不休。學校裡的模擬研究則時間較短。

這種研究法有幾個好處：(一)它可以測驗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所考慮的因素；(二)它可以測驗軍人與文人在決策過程中的關係——包括合作與衝突在內；(三)它可以迫使決策者在作決定時，明白表示他們所想完成的目標、所使用的手段，及所作的基本假定；(四)它可以根據各國的行動和反應來判斷整個事件的可能後果；(五)同一情勢可以重複演練，或由不同的參與者來演練，以測量其過程與結果的異同⁽¹⁶⁾。

模擬研究法雖然在美國已相當普遍，但學者並不一致認它為一種可靠的研究方式。其理由也可以略舉如下：

(一)模擬演習中的參與者究竟不是負責任的決策者，他們的心理狀態會與決策者完全相同或相近嗎？如果不，他們的決策過程與決策是否會與實際狀況相符呢？這恐怕是模擬演習最大的缺點。因為與物理或化學實驗不同，主持模擬演習的人不能創造出與實際完全相同的情況。

(二)參加模擬演習的人，究竟應包括那些人？很難決定。例如俄國與中共對外政策是由那些人參與？在決策過程中各人所佔分量如何？如果外交政策的決定受國內政治勢力分配的影響，那些政治勢力的代表應參與決策？

(三)這種研究法似乎比較適合於重大危機。例如假設俄軍攻擊西柏林了，北約國家的反應如何？如何反應？如果反應的行動不當，後果不佳，或許可以改進。再假設如目前蘇伊士運河開放了，對美、蘇兩國的政略和戰略地位有何影響，其他關係國的反應如何，亦可用模擬演習求得部分了解。但是對於日常發生的國際事件應用此法，既不經濟，也不適當。例如一艘中國漁船在菲律賓宣布的專屬漁區內捕魚，其後果如何，似難用模擬方法求得正確了解。因為誰是這一問題的決策者，他們的心理態度與決策根據為何，不如用傳統個案研究法或調查方法來研究，比較可靠⁽¹⁷⁾。

(四)此種模擬方法不能與傳統研究法分離。傳統研究法着重詳細的、個案的研究。例如對希特勒或杜魯門的某些重要決定，早有許多文件與著作表示出來，經由一些大學生模擬演習而獲得更多發現的可能性似乎很小。

(五)模擬只是模擬，正如軍事演習不是實際戰鬥。對模擬發現的可靠性，我們必須從歷史研究中去求證。但從事模擬研究的人很少這樣做⁽¹⁸⁾。

模擬研究法儘管有不少缺陷，但它已被應用到核武器的擴散，戰略原則對國際隱定的影響，武器系統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及威脅與敵意國際行為的關係等的研究上。

四、集合資料——數量方法 (Data-Collection-Quantitative Method)

陶意志 (Karl W. Deutsch) 教授可說是用數量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的要角。他用這個方法，特別是社會溝通 (Social Communication) 理論，來研究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形或^⑱；又用此法來研究區域整合^⑳。他提倡量化方法，也不忽視「質」的重要性。

他認為國際政治上的許多概念須嚴格界定，許多假設也需用量化方式來求證。例如今天的世界是否比從前更國際化？換句話說，今天是否更趨向一個世界呢，還是仍與從前一樣着重在個別國家？共產世界是像五十年代那樣緊密結合呢？還是走上多元道路？當我們說，某國政局不穩定，我們以什麼為標準？今日世界各國政府的行政權威都在增加中嗎？這種權威是日漸集中於少數統治階層之手呢？還是擴展到一般大眾？各國的經濟生活是越來越受政府控制呢，還是相反？有些地區是否已逐漸放棄了民族主義本位而走向區域聯合？此類問題非常廣泛。研究特殊國際政治的學者或許不感興趣。然而如果要探索國際政治的遠程趨勢，這些問題是非問不可的。陶意志的目的是用實際資料，來說明或預測某類國家的行為。

陶意志認為如果在方法上要超越常識，首先，要確定我們在國際政治上究竟要取得何種知識；其次，要對那些事實的了解是取得這種知識所必需做個初步決定；第三、要對資料與政治後果的關係作初步假設；第四、要測定那些資料可以證實或推翻這項假設，而證實的標準又是什麼。

陶意志批評一般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太受文學傳統的影響。他認為這些學者費了許多精力來收集有關資料，却費很少精力來運用這些資料。他認為資料處理是今日政治學的重要課題。如果資料不足，學者應考慮是否可用意見調查、訪問、實驗等方式來補充。一旦有了足夠的基本資料，研究者便可用來證實，推翻或修改原有假設^㉑。

集合資料方法主要關心三個問題：(1)將國家作系統分類；(2)決定某類國家間的行為模式；(3)確定可以預測國與國間關係改

變的因素。它所着重分析對象是國家和國際組織，而非個人或團體。

國家如此之多，其雙邊，三邊或多邊關係更是複雜萬狀。我們自然不能一一予以研究。但正如我們依性別、年齡、智商、教育、居住地等因素來區分個人一樣，學者亦找出一些有說明力的因素來區分國家。例如陶意志把區分各國的變數分為十一種，每種因其數量不同又分為五級。這十一個變數是：(1)國民總生產，(2)國民平均所得，(3)人口，(4)人口年增加率，(5)非農業工人人口比率，(6)居住在兩萬人以上城市人口比率，(7)十五歲以上人口識字率，(8)每千人中日報銷數，(9)二十歲以上人口投票率，(10)居民消費超過或不足熱卡百分比，(11)人口每千人死亡率²²。陶意志又根據(1)主權，(2)西方影響，(3)憲政穩定性，(4)政治一致性，(5)宗教一致性，(6)語言一致性，(7)地域一致性，(8)人種與民族分歧性，(9)選舉制度，及(10)反對團體存在的自由，來區分國家²³。

上面談及的變數太多了，要找出彼此的關係仍很困難。但可選擇出一些變數而找出它們間的關係。例如冷納 (Daniel Lerner) 曾發現成人識字率與國民平均所得及非農業人口有正的關係²⁴。那麼此三個變數便可用一個變數來加以簡化。

「學者已利用集合資料方法來劃分國際區域，說明區域內及區域間之交往，解釋同盟的盛衰，同盟與戰爭的關係，以及國際整合的程度^{24A}」

五、傳統派對科學方法的反應

由上所述，科學派國際政治學者擴大了他們研究的視野。由正式體制的研究進展到個人和團體的行為表現。他們設計了一套精巧的方法來「觀察、記錄、歸類及計量經驗性資料」。常常捨文字而用數學。以便於「清晰的思考與意見的溝通²⁵。」這種求精、求實、求果進的科學方法理當為所有國際政治學者所接受才對。事實不然。例如赫茲 (John H. Herz) 在其所著原于時代的國際政治²⁶一書前言中說：

「這是一本老式的書。它不是小組或集體研究的成果。作者也不是以討論會或研究會報告人的身分執筆的。它不是演講集

，也不是實地調查或廣泛旅行後的結晶。作者從沒用過一張電子計算機卡片，也沒作過深度的或其他形式的專訪。既無民意調查，也未分發問卷。實際上，全書沒有任何圖表或統計數字。本書只是將既有智識應用到各種問題上的一個產品。」

這篇前言顯示赫效率走傳統的道路，而不願採用集體研究，實地調查、電子計算機、圖、表與統計，而這些往往是科學派常用的工具。

一九六六年波爾(Hedley Bull)在世界政治季刊上寫了一篇「國際政治理論的古典(傳統)研究法」²⁷，引起國際政治學者很大的爭論。他嚴厲地批評了科學方法。由於此文對科學方法作了有系統的批評，在此有予扼要介紹的價值。

首先，他認為以數學邏輯及嚴格的科學方法所能研究的國際政治中有的只是道德問題，難有客觀答案。有的雖屬經驗範疇，仍不能作肯定答覆。例如主權國家集合究竟構成政治社會呢，還是政治體系？如果是國際社會，這種社會是否須建立在共同的文化基礎上？目前的世界外交架構是否奠立於此種文化上？戰爭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如何？是否有正義之戰？一國是否有權干涉他國內政？如有，其條件如何？國際社會主體限於國家嗎？抑以個人為最後主體？對於這些問題，無法有科學的答案，或者科學只能提供不着邊際的答案。

其次，波爾認為科學派希望把國際政治造成知識可以客觀地加以檢驗；²⁸國家行為有關的客觀事實；²⁹所得資料無法作可以控制的試驗；³⁰世事變化迅速；³¹理論與事實不僅是主觀與客觀的關係，同時也具有因果關係。在此種情形下，波爾認為國際政治學者勢必仍然要採用哲學方法來檢討基本問題。他認為科學派的任何成就都不可能構成後世繼續研究的堅實基礎。

第三、波爾認為如果現象相同，當然可以用累積方式來證明某種理論，此時用數學形式來說明國際政治自無不可。但是不能僅僅用數量來證明其重要性，或者給予某些事實以其所不具有的重要性；或者為其量化的重要性。例如以陶意志為主導的社會溝通研究，常調查國際信件，條約、新聞報導、學生交換等的數量，但是為求客觀量度，波爾認為陶意志忽略了單位間的差異。例如一封信與另一封信的差異，一個條約與另一個條約的差異，報紙上某欄新聞與另一欄新聞重要性的差異。

第四、國際政治理論需要更嚴格，更精確的處理，但是這種許多是基於嚴格邏輯體系的。例如公法學家自維多利亞(Victoria)到奧本海(Oppenheim)；國際政治學者如艾榮(Raymond Aron)、霍夫曼(Stanley Hoffman)、瓦茨(Kenneth Waltz)等。

第五、波爾認為科學派由於脫離歷史和哲學，使他們失去自我評價的標準。其研究結果往往是不成熟的，更未觸及道德與政治的關係。

這種對科學方法的批判，並不始於波爾。因為科學方法究竟能否完全應用到政治學的領域中來是一個爭執已久的問題。例如卡爾(E. H. Carr)在二次大戰結束時再版的國際政治著作中，即明白指出政治科學和物理科學不同。就物理科學而言，事實的考察及應用事實的目的，不僅在理論上是分開的，在實際上也是分開的。癌症研究者在工作實驗時固然以消滅癌為目的，但嚴格的說，此項目的與他的研究是兩回事。他的結論只是研究實況的報導。客觀的事實不會隨主觀願望而轉移。政治科學則不然。政治學的興起原有建立美好政治生活的目的。研究者固然會考察到人類在某種情況下，表現某種行為，但此與客觀事實不同。因為行為者如果願意可以改變他的行為。而研究者如能說服許多人，便也能改變政治行為的常態。例如馬克斯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即在改變世人對資本主義的態度，並且獲致相當的成功²⁸。克瑞克(Bernard C. Crick)以為無論就對象、關係及待證的命題說，國際政治均無法成為量化科學。推動科學運動者，在追求假科學時捨棄了政治的現實²⁹。霍夫曼(Hoffmann)除了指責科學逃避現實外，並且認為他們肢解了現實。他以為國際政治的研究不應盲目借用自然科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他指責科學派為了量度，便忽略了不能量度的因素。因之，他們的模型不僅不能說明現實，而且使研究走向虛幻之路。他說：

「由於誤認歷史為一個『倉庫』，分離而互不相干的事實均堆存在那兒；同時，由於誤信政治現象都可歸結到一個共同的可量度的因素，就像貨幣單位之於經濟學一樣，結果。現實便被肢解了³⁰。」

不僅如此，有些學者並且批評科學派是假科學，借科學之名，使學術界與一活生生的政治現實脫離關係。他們指控科學

派利用古怪的名詞和數學公式、方程式及圖表，來「說明或混淆淺顯的道理」。由於科學派的活動與政治現實脫節，他們不會遭到任何政治上的風險。因此，其所研究的對象往往是為學術而學術，「對現實政治毫無影響力，也不受現實政治的影響」①。

總之，科學派的批評者認為科學派爲了量化與累積知識，忽略了與國際政治有重大關聯的道德與目的問題，忽略了政治的現實，忽略了許多不能量化的現象，忽略了因素間質的差異，忽略了國際現象是否真的可以比較、可以量度。

✓六、傳統派與科學派爭執平議

國際政治學者關切的主要對象是國家、國際組織和其他國際主體的行爲。科學派認爲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的研究方式，並無不同，都可用科學方法來找尋其規律。並且認爲這是唯一能使國際政治研究可以印證、而其成果可以累積的途徑。

但是社會現象，尤其國際政治現象，是否允許學者作完全客觀的探討呢，「自然科學家研究自然現象，其分析、實驗的對象多與人無直接關係。所以他們立場超然，不致爲感情所左右。同時，他們研究的個體，在其純粹的狀態下，有共同性。社會科學家是研究人與人間的關係。他們既生存於人類社會中，便不可能像自然科學家研究自然現象那樣的客觀和超然。同時，他們研究的對象也不容許他們作太多的操縱和控制……」②。

不僅在主體與客體的關係上，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研究不同：就國際現象的複雜性而言，研究者窮年累月也無法透澈了解歷史上的某個時代。因此，他只有捨棄次要，而致力於重要因素的探討。結果，他便不能對全盤國際政治作完全客觀的研究。國際政治上所謂「真理或已經建立的事實」只不過是「在判斷者間的一致見解而已」③。進一步說，社會科學家必須以文字來界定概念，而這些界說都奠基於社會的假設。同時，國際政治學者不能不研究從前的記錄和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是個別學者對國際政治的評估，它本身亦構成國際政治的一部分。所以在本質上說，社會科學家也不能完全免於主觀④。

✓不僅如此，社會現象的「規律」不能構成自然現象的「法則」。因爲人在明瞭此種規律後，可以有意识地改變其行爲，不受

「此種規律的拘束」例如生物學家達爾文的進化論，說明生存競爭、自然淘汰、差異、和適者生存是生物進化的過程。這個理論被某些學者和國家採用為種族歧視和帝國主義的根據。但是今天大多數社會都替傷殘和低能人服務，並不「淘汰」他們；而且幾乎所有國家都已放棄了「白人的責任」(White man's burden)等侵略的藉口。這便是人類行為超越科學定律的例證。

但是說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並不意味社會現象不能或不應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前面說過，傳統派與科學派一樣，着重資料的搜集與證實，邏輯的分析和判斷。他們都希望經過觀察來瞭解國際現象。但根據羅斯洛 (James N. Rosenau) 的分析：

「傳統派從國際主體在特殊時間、特殊情況下的行為來找尋國際現象的意義；科學派則企圖從不同世代、不同情況的國際現象中找尋重複發生的行為模型。對於從事傳統「遊戲」的學者，只要以他豐富的資料、明晰的敘述和解釋，能充分說明國際政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問題，便算獲得了勝利。另一方面，科學家的宗旨則是尋求可以包含及解釋愈來愈多國際政治現象的一般理論。兩派間特殊性——一般性的差異又導出另一項差異。傳統派的特殊化取向使他渴望找出他所專注的國際政治問題的真的陳述；科學家因為注意重複發生的情況，所以渴望對他研究的對象找出或然的陳述。對科學家來說，國際政治的真理總是某類行為可能發生的百分比。其發生的或然率愈大，愈足以說明國際現象的結構。傳統派的目的不包括或然的陳述。他所關心的是觀察研究一個固定時間內，曾經發生或未曾發生的特殊事件的順序。考驗他的乃是確定事件如何發生、為何發生、而不在預測其發生的或然率。」

由上看來，傳統派與科學派都在發現真實，都希望能夠正確的敘述、說明，甚至預測國際現象。但是由於傳統派着重特殊事件的研究，而科學派致力於發現一般現象，兩派對於國際政治這門學科的發展有不同的影響。傳統派研究特殊事件或特殊決策者，儘管資料豐富、推理允當，往往是以一大羣變數來敘述、分析和說明某一時代的某一特殊事件。這種對於事件的實然的陳述，可能很有趣，也有說明力，但是它們太特殊化，不能聯合起來構成科學的知識。科學家着力的是一般現象，認為一般法則是知識累積所必要。他們認為既然不能同時處理所有的變數，就只有用有限的變數來說明某類現象。希望經過共同的努力和

印證，找出一般的原理³⁶。

「科學派期望其研究的過程可以重複，其結果可以比較，其知識可以累積。因此，他在選擇國際現象時必須根據明白的假設、概念和程序，使其他學者可以搜集相同的資料，通過相同的程序，得到相同的結論。傳統派的結論往往難作肯定的評價。由於他們並不公開其研究方式，所以也無法印證重複。」

「爲了使國際政治的研究有長足進展，我們勢必要採用科學方法，將複雜的現象，例如戰爭、區域整合、民族主義等，分割成可以試驗的變數，找出它們的關係，進而說明戰爭、區域整合等概念，並指出在什麼狀況下，戰爭的或然率高，在什麼條件下，區域整合的趨勢強。但在目前仍有許多重大問題，特別是與現實政治有密切關聯的問題，不易用科學方法來分析。截至目前爲止，科學派的成就還有限。另一方面，傳統研究雖然不能構成累積的知識，但國際間有許多現象確實需要以歷史方法做比較深入、仔細的探討。例如馬丁路德和希特勒的思想、人格、環境、及影響，在未來恐怕不可能完全重複。傳統派對他們的分析很有助於我們對某些國際政治現象的了解。」

總之，傳統派與科學派各有所長。在國際政治的研究上可以相輔相成。我們希望傳統派重視科學派研究的成果，並希望科學派不要忽略傳統研究的智慧。我們更希望在研討各種初步問題之後，科學派能把成果綜合起來，幫助我們了解國際政治的全貌。

註 釋

① 參閱·連戰·「政治行爲學研究的新趨勢」，政治學報·論文與會報（五十九年十二月）一一一。

② F. Raymond Plati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Problems of Evaluation and Advancemen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67,) p. 13.

③ Kenneth W. Thompso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Survey of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Review of Politics*, 14 (1952), pp. 433-467.

- ③ Herbert McClosky, "Concerning Strategies For a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VIII, No. 2 (January 1956), pp. 282-283.
- ④ Morton A. Kaplan, "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XIX, No. 1 (Oct. 1966), p. 15.
- ⑤ David B. Bobr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Approaches* (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Headline Series*, No. 209 (February 1972),) pp. 6-7.
- ⑥ Richard A. Brody,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Qua Science: The Emphasis on Methods and Techniques," Klaus Knorr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12-113.
- ⑦ Klaus Knorr and James N. Rosenau, "Tradition and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Knorr and Rosenau (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9-12.
- ⑧ 本文因素分析法之論述，并譯成德文且 David B. Bobrow, 前譯者，四三一—四八頁。參見：Rudolph J. Rummel, "Understanding Factor Analysi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1, No. 4 (December 1967), pp. 444-480; Raymond Tanter, "Dimensions of Conflict Behavior Within and Between Nations," *Ibid*, Vol. 10, No. 1 (March 1966), pp. 41-64; Hayward R. Alker, Jr., and Bruce M. Russett, *World Politics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 ⑨ 魏泰·「內容分析」，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三冊，政治學（民國六十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頁三十三。
- ⑩ Dina A. Zinnes, Robert C. North, and Howard E. Koch, Jr., "Capability, Threat,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1,) p. 472.

⑪ 同註⑨。

⑫ 同註⑩，頁四七五。

⑬ 這個進一步研究是由 Ole Holsti, Robert C. North 和 Richard A. Brody 所作，發表在 David J. Singer (ed.), *Quantitativ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本文根據註⑤，頁四九一五四的摘述。

⑭ Robert C. North, et al., *Content Analysi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3); Allen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New York, 1960); Alexander George, *Propaganda Analysis* (Evanston, 1959)。North 等人是研究一九一四年時決策者的認知在衝突升高中的角色。Whiting 用內容分析來研究中共的態度及決策程序。George 則用內容分析來預測德國領袖在第二次大戰中的決策。

⑮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前，德國軍方對波蘭軍事力量和政治企圖極為關切，因當時德軍僅限十萬人。一九二九年，德國參謀本部青年軍官曼斯坦 (Erich Von Manstein, 後升將軍) 負責安排防衛波蘭進攻東普魯士或上西里西亞 (Upper Silesia) 的一項軍事演習。他發現戰爭爆發前必有嚴重的政治衝突。在此一衝突中，他認為德國應儘量避免給法國和捷克以波蘭盟邦身份參戰的理由，並且避免使國際聯盟有不宣布波蘭為侵略國的藉口。曼斯坦建議一項軍事政治聯合演習，使軍、政領袖可以互相學習。由德國外交部高級官員扮演國際聯理事會主席和德、波兩國外交部長。曼斯坦在他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說：當時「波蘭外長指控德國挑釁的成功，使「德國外長」啞口無言。同時，國聯的拖延不決也在演習中充分表現。因此，德國外交部官員認為此項演習極有價值。(Herbert Goldhamer and Hans Speier, "Some Observations on Political Gaming," *World Politics*, Vol XII No. 1 (Oct., 1959), pp. 71-72)。在東京戰犯法庭的證物中顯示，日本一九四〇年成立的日本全面戰爭研究所 (Japanese Total War Research Institute) 也曾作侵略的演練。由日本政府高級官員和專家擔任太平洋區列強的政治與軍事官員，日本則由陸、海軍與內閣分別代表，採取行動前並充分協調。此項演習曾預想到珍珠港事變後日本政府採取的實際步驟。(同前文，頁七二。)

⑯ 從教育立場來說，「模擬」有特別的好處。首先，它使參與者積極瞭解當前國際政治。因為唯有瞭解國際現實，他才能分析和採取行動。這時的實際知識就不再是毫無關聯的空洞知識了。同時，政治上的原理原則可以應用到實際行動上，也就增大它們的重要性。當然，模擬演習中的裁判者必須時時指導各個參與者。

其次，參與模擬演習的學生往往想追求更多的知識。以前認為次要的知識，現在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例如武器發展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或是某些國家決策者的思想背景，所面臨的問題及決策程序。

第三，參與者如認真而富責任感，則必然領會到參與決策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種問題，例如情報不足，事實欠肯定，時間與事變的壓力、道德上的負擔、知識的欠缺等。凡此均會使參與者領悟到國際政治決策之極端複雜性。(Goldhamer and Speier, 前引，頁七九。)

- ②① 梭羅·J. David Singer, "Data-Ma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havioral Science*, Vol. 10 (Jan. 1965), pp. 68-80.
- ②② David Vital, "On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 Back to Machiavelli," Knorr and Rosenau (eds), 註②輯·pp. 148-149.
- ②③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63).
- ②④ Political Commun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New York: Doubleday, 1954),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②⑤ Karl W. Deutsch, "Toward an Inventory of Basic Trends and Patterns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LIV (1960), pp. 34-57, 收入註②輯·頁四五一—四五二。
- ②⑥ 註②輯·頁四五四—四五五。
- ②⑦ 註②輯·頁四五六—四五七。
- ②⑧ Daniel Lerner,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Social Systems: A Statistical Exploration in History and Policy,"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Oct. 1957), p. 268.
- ②⑨ 註②輯·S. Brans, "Transaction Flow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6, (1965), pp. 880-898; J. D. Singer & M. Small, "The Composition and Status Order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815-1940," *World Politics*, Vol. 18, (1966), pp. 236-282.

- ② 李其泰：「國際關係研究的新途徑」，美國研究，第三期（六十年九月），頁二六二。
- ③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④ 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Vol. XVIII, No. 3 (April 1966), pp. 361-377.
- ⑤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Second edition 1946),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p. 3-5.
- ⑥ Bernard C. Crick, The American Science of Politics (London 1959), pp. 247-248.
- ⑦ Stanley Hoffman (ed.), 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0), p. 45.
- ⑧ Hans J. Morgenthau,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of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race V. Harrison (ed.), The Role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 J, D. Van Nostrand, 1964), p. 117.
- ⑨ 羅其真：「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華青年（紐約），第一期（一九七一年三月），頁一一一。
- ⑩ James N. Rosenau,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1), p. 12.
- ⑪ Paul Tayl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Idea of Progress and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Servant," Political Studies (London) Vol. XX, No. 3 (Sept. 1972), pp. 270-271.
- ⑫ 同註⑩，頁十頁。
- ⑬ J. David Singer, "Theorists and Empiricists: The Two-Cul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ames N. Rosenau, Vincent Davis & Maurice A. East (eds),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2), pp. 82-85.